

**THE STRUCTURAL SHIFT OF THE WORLD ECONOMY  
AND POTENTIALLY BIGGER MARKET ECONOMIES:  
WITH A FOCUS ON CHINA IN EAST ASIA**

**HITOSHI HIRAKAWA**

PROFESSOR OF KOKUSHIKAN UNIVERSITY  
EMERITUS PROFESSOR OF NAGOYA UNIVERSITY

**ABSTRACT**

Entering this century, structural shift of the world economy has proceeded.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East Asia have attained outstanding growth surpassing other regions in the world for the last half century, and China today spearheads it. The growth in this region from the 1960s to 1980s was led by the newly industrializing economies such as Korea, Taiwan,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However, leading countries now change to China and others. In this paper, we try to understand the shift of the growth mechanism from NIEs model to potentially bigger market economies (PBMEs) model fo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economy.

**Keywords:** Asian economy, structural shift, neighboring countries, world economy, PBMEs (potentially bigger market economies), China

# 世界经济的结构性变动与 潜在的巨大市场经济（PBMEs）： 瞩目东亚的中国<sup>1</sup>

平川均

国土馆大学教授·名古屋大学名誉教授

## 摘要

进入本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发生了结构转换和制度更新。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实现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长，其中的中国现在走到了最前列。1960年代到1980年代新兴工业国（NIES）引领过东亚的经济成长。现在中国取而代之成了领先国家。本文拟对这种从NIES模式发展到PBMEs模式的成长机制进行分析。

关键词：亚洲经济，结构转换，周边国家，世界经济，潜在的大市场经济（PBMEs），中国

---

<sup>1</sup> 2015年8月29—30日，蒙日人才开发中心与蒙古国立大学在乌兰巴托召开了《日本与蒙古的关系——东亚21世纪新秩序重构的历史、现在、展望》第8次国际研讨会。在这次国际研讨会上，笔者发表了题为《结构性转折的世纪经济与新兴经济及其周边经济》的报告。本文就是以该报告为基础，用新题目重写而成的。本文的数据基本上引用自上述报告，同时加入了部分新的资料。

## 前言

进入 21 世纪后, 世纪经济在进行结构性变动和制度重组。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取得了出类拔萃的成长, 东亚地区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圈。对发展中国家的称呼也出现了新兴国家、新兴经济、新兴市场、BRICs 等许多新的名词。在国际社会, 新兴国家参加的 G20 对解决越来越深刻的国际金融问题的意义越来越大。最近, 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 (AIIB) 成立, 许多发达国家加盟。这些结构性变动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转折的最大的推动者是中国。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实现了世界最快速的经济成长, 2010 年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进入本世纪后, 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强。世界经济正在进入新的阶段。

必须注意的是, 新兴经济特别是中国的成长的实现是与全球化紧密相联的。与此同时, 新兴国家的发展机制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 1990 年代末以来, 以中国为首的人口大国处在前所未有的有利的国际环境里。当然, 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被全球化的世纪经济捉弄, 经历着激烈的景气变动。新兴国家在持续成长的问题上也存在着许多难题。

但是, 冷静地看的话, 既然连发达国家都遇到了巨大的成长障碍, 那么新兴国家在摸索中前进就是很自然的。东亚地区过去半个世纪的成长, 先头集团由 NIES 到 ASEAN、中国, 在变化中成长, 其经济发展也由点到面, 成长为世界经济中具有最大的影响力的经济圈。这一点才应该引起注意。其空间现在扩展到了南亚。从中长期来看, 正视这一趋势的话, 时代已经由以美国为轴心的亚洲太平洋经济的时代向以中国、ASEAN、印度等为中心的亚洲经济的时代转折, 甚至在进一步向欧亚经济的时代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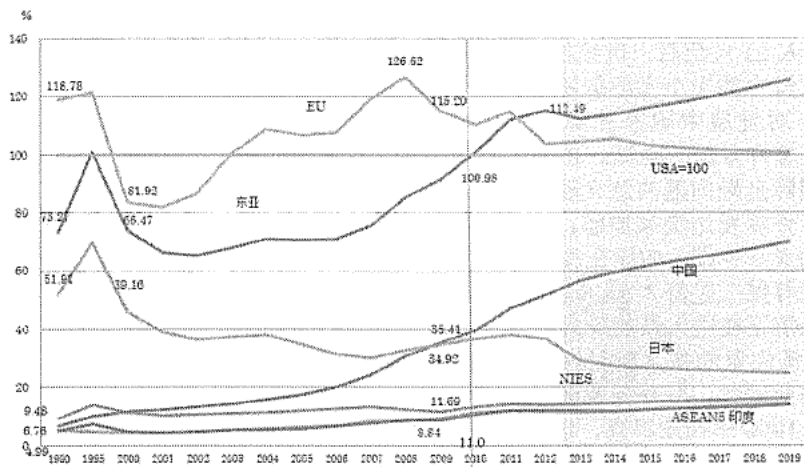
直到半个世纪前, 普遍认为很难期待亚洲会成长。但是亚洲出乎意料实现了其成长。但是, 今天的亚洲面临着伴随其成长带来的结构性变动而产生的新课题。

本文结合全球化背景下新兴国家的发展机制, 探讨和展望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国家推动的世界经济和亚洲经济的结构性变动, 并从国际方面分析这种结构性变动的新课题。

## 1. 世界与亚洲的结构性变动

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处于重组的过程中。这种见解现在已经是常识了。支撑世界霸权的是经济实力。这种经济实力正在发生巨大变化。世界经济的结构进入本世纪后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美国经济仍然是世界第一, 但已经不是唯一的大国。亚洲地区的结构也同样如此。维持压倒性经济实力直到最近的日本把这一地位让与了中国。20 世纪后半叶以来, 从新兴工业经济群 (NIES) 到 ASEAN 各国、中国、后发的 ASEAN 各国、印度等国, 亚洲不断掀起成长的浪潮作为新兴经济圈走向世界。进入本世纪后, 中国走到了亚洲的先头的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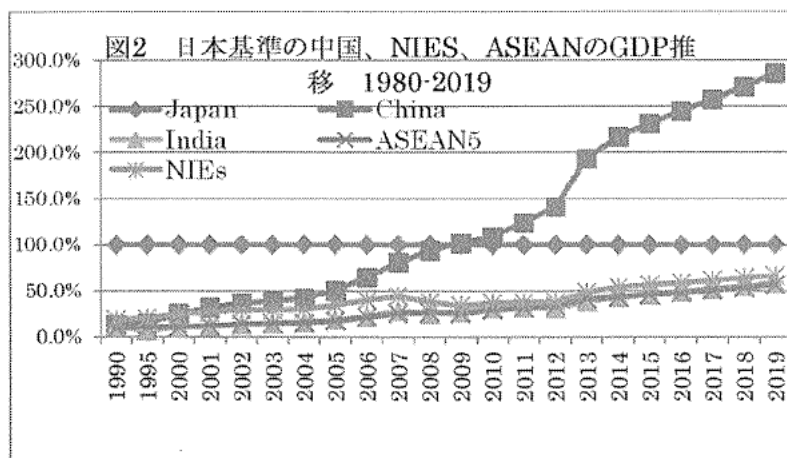
图1 以美国为基准的东亚经济体以及EU的经济规模 (1990-2019)



注: 1990年的比率由下至上依次是NIES、中国、ASEAN5、日本、东亚、美国、EU, 以美国的名义GDP为100。NIES包括香港、韩国、新加坡、台湾, ASEAN5包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

出典: 据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October 2014年作成据同2013年推算。

图1是世界经济与亚洲经济的经济规模的变化图。从这个图表可以看出几个重大变化。从GDP的规模来看,在2010年,东亚超越了美国,在东亚中国又超越了日本。从东亚经济的推移来看,以2004-2005年前后为界其趋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东亚经济的趋势在此前与日本经济连动,但以此为界与中国经济连动。就是说,东亚地区的主导国发生了交替。2012年也引人注目。这一年,东亚的经济规模超过了EU,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圈。



注: NIES 包括香港、韩国、新加坡、台湾。ASEAN5 包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

出典: 据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October 2014 作成或据同2013年推算。

图 2 是以日本的 GDP 为基准看中国、ASEAN、NIES、印度的经济规模的推移。中国的 GDP 在 1990 年还不到日本的十分之一，2000 年是日本的四分之一，2005 年达到二分之一，2010 年赶上日本，2014 年达日本的两倍，瞬间赶上和超过了日本。NIES 和 ASEAN 有些曲折，但同样实现了成长，过去几十年在扎扎实实的接近日本。印度的轨迹和 ASEAN 差不多。东亚是成长的亚洲（日本除外）与停滞的日本交叉点的地区。这一现象也表现在亚洲经济的各国所占比例中只有日本是减少。

经济结构的这一变化很自然地唤起东亚各国人们意识的变化。从最近的中日外交关系来看，出现了相互反应过剩，对立加深的现象。特别是，试图维护旧秩序的日本和加深了自信的中国之间产生了相互认识的不同，出现了负的连锁反应，双方民族主义倾向明显加强。现在出现的现象是历史上出现过多次的由旧秩序向新秩序转折的现象。亚洲各国富有多样性，需要进一步持续发展作为地区经济圈获得的丰富成果，并使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相结合。

总之，进入本世纪后，无论是世界还是亚洲都处在急剧的结构性变动是漩涡之中。下一节探讨支撑这一变动的结构及其展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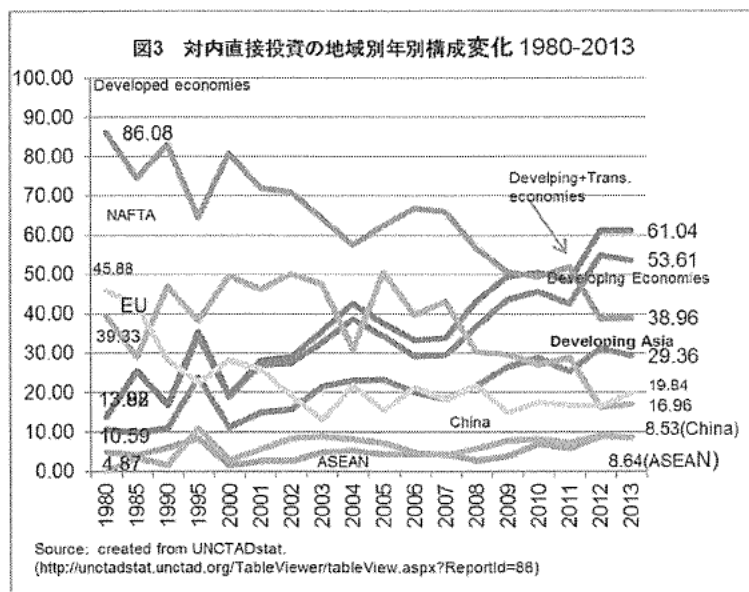
## 2. 发展机制的变化

从东亚的成长到亚洲的成长，新兴经济的成长机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实际上，亚洲的成长机制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发生了根本的变化。20 世纪后半叶，日本实现战后复兴后，跟随其后的是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的“亚洲四小龙”（NIES）的发展。这些国家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生产和出口劳动集约型产品，是出口主导型的发展。不过，其发展的初始阶段，从海外诱致的外国企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这些国家制造的产品出口到了发达国家的美国，市场在发达国家。但是，进入本世纪后，引人注目的新兴经济不是 NIES，而是中国、俄国、印度等“BRICs”。这些国家没有期待 NIES 式的出口主导型发展。BRICs 的经济结构没有共同性，其共同性是巨大的人口规模。在全球化的经济结构下，以跨国企业为中心的发达国家的企业，是注意到这些国家巨大的人口规模所决定的国内市场的成长性、潜在力而进入这些国家的。

图 3 显示了世界的直接投资（FDI）在不同地区的接受情况及其变化。直到 1980 年代，接受 FDI 压倒性的是发达国家。但是，进入本世纪后其比例逐步减少，进入 2010 年代后减少到了 50% 以下。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的合计占到了 60%。世界 FDI 的中心是亚洲。接下来还会看到，今天，其投资目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本世纪初开始，有关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论流行起来，把人口的供给力作为发展的潜在力指标。从 NIES 开始，丰富的劳动力供给是亚洲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因素。从 20 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发展中国家出生率的下降绝对性地以及相对性地带来了“劳动力膨胀”的状况（大量年轻的非劳动人口长大成人而加入到劳动人口中来导致了劳动人口的绝对增加；不仅如此，伴随出生率的下降劳动人口对非劳动人口的比例也会增加）。如能确保雇佣，这

种劳动力膨胀的状况就是对发展有利的条件。亚洲国家就是抓住这个有利机会实现了发展。这一事实使人们认识到提供丰富的就业人口是成长的条件。在 20 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巨大的人口与贫困相关联,被认为是成长的枷锁。但是,进入本世纪后,这一认识发生了 180 度的转变,巨大的人口被认为是发展的潜力了。就是说,对人口的认识发生了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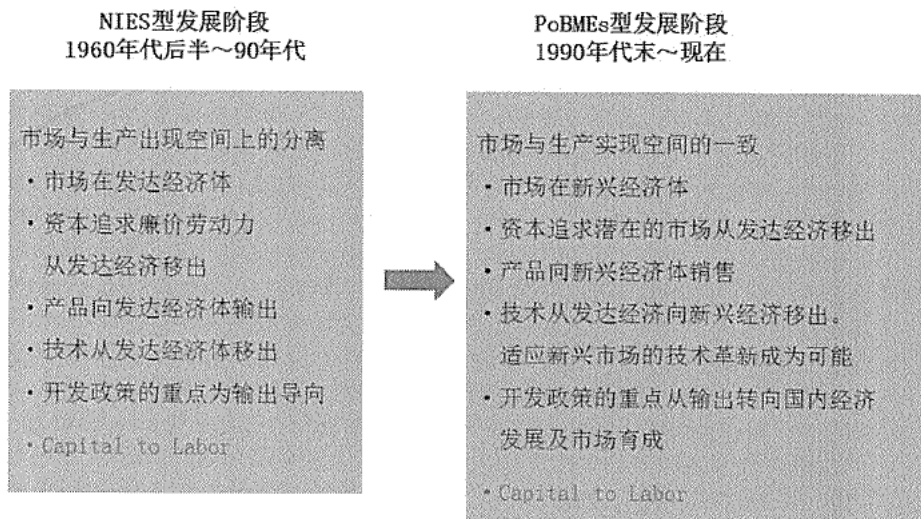
随着全球化的进展,世界的企业家们面临着寻找新的市场的压力。随着发达国家国内市场的成熟化和成长率的低下,他们把注目点放到了这些潜在的市场(Potential Market)。世界的直接投资由发达国家转向拥有巨大人口的新兴经济。直到最近,世界的直接投资压倒性的投向发达国家,主要投资结构是发达国家间的相互投资。这一点从图 3 能看出来。但是,现在面向新兴国家的投资超过了世界 FDI 的一半。这意味着向新兴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特别是支撑着拥有巨大人口规模的新兴国家的经济成长。笔者认为这是新兴经济由 NIES 型发展向潜在大市场经济(PBMEs)型发展的转折(平川 2014a)。企业进入新兴经济更重视的不是出口,而是内需。可以称之为由 NIES 阶段向 PBMEs 阶段的转折。这一倾向确实越来越强。

据日本经济产业省的通商白皮书统计,一个家庭的可処分所得额超过 35000 美元的富裕层,2010 年发达国家是 7 亿 1000 万人,中国只有 4400 万人,ASEAN 是 1700 万人,南亚 2500 万人。但是,据推测,2010 到 2020 年,这一数字发达国家会增加 6100 万人,中国会增加 9800 万人,ASEAN 会增加 2000 万人,南亚会增加 3300 万人。一家的可処分所得在 15000-35000 美元的上位中所得层的人口,到 2020 年预计是发达国家 2 亿 5000 万人,中国 3 亿 5000 万人,ASEAN 是 1 亿 2500 万人,南亚 2 亿 5000 万人(日本经济

产业省 2013 年)。上位中所得层人口仅印度就相当于所有发达国家的总和。显然,今后的主要市场将移向亚洲的新兴市场。可以预见,亚洲将出现巨大的潜在市场。

换言之,1960 年代后半期以来东亚的发展是 NIES 型发展。NIES 的发展主要是美国、日本等的制造业企业谋求低劳动成本把生产基地转移到韩国、台湾、新加坡等地,在这些地区组装、加工,再把制成品出口到美国市场,依靠这种出口主导型的发展。这一模式现在在逐步转化为 PBMEs (潜在市场主导型) 的发展。包括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在内,庞大数字的企业向拥有巨大人口规模的新兴国家中国、印度等寻求新的市场,向这些潜在市场投入资本和技术,创造出新的成长极。NIES 型发展的消费市场在外部的发达国家,进入 PBMEs 阶段后,新兴国家本身就是市场。另外,中国可以说是由沿海地区开始的 NIES 型发展向 PBMEs 型发展转折,其发展模式发生变化的国家。

图 4 新兴国家经济发展的资本、劳动、市场的空间关系:概念图



资料出处: 笔者作成。

图 4 从资本、劳动、市场的空间关系把上述变化概念化了。在 NIES 阶段,发达经济的资本为谋求廉价劳动力向新兴经济移动,制造的产品再出口到发达国家的市场。但是,现在到了 PBMEs 阶段,发达经济的资本为谋求有希望的潜在市场向新兴经济移动。主要的市场就是新兴经济本身。总而言之,东亚的经验是,不光是外资企业,当地企业同样将在这一从 NIES 向 PBMEs 转变的机制中发展,或者诞生。当地的企业将把这一机会转化为自身成长的机会。

表 1. 新兴经济通过直接投资 (FDI) 的发展模式

主要 市场 地	发达 经济	NIES 型 FDI 发展模式 (出口主导型模式)	发达国家间 相互 FDI 型发展模式
	新兴 经济	PoBMEs 型 FDI 发展模式 (潜在市场主导型模式)	
		新兴经济	发达经济
主要生产地			

资料出处：笔者作成。

上述发展机制的变化，可以从生产和市场的主要地的角度整理如表 1。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是生产和市场（消费）通过在发达国家内相互直接投资而进行的发展模式，即第 1 象限的模式。发达国家间相互投资支撑其共同发展。但是，1960 年代后半期开始发展起来的 NIES 与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不同，是第 2 象限的发展模式。即：生产地在新兴国家，主要市场在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因此，其发展政策是出口主导型的。可是，NIES 型发展的成功，其结果导致的内需扩大，不久便带来了人们对巨大的人口规模的认识的变化，即由贫困的指标向成长的指标的认识变化。因为，在 NIES，丰富的就业人口支撑了劳动集约产业的发展，这一事实使人们提高了对劳动力人口规模的关注。其结果，企业开始认识到人口大国是潜在的大市场经济，人口资源丰富新兴国家成为主要的投资地。企业期待的投资地是具有潜在力的新兴市场，其期待这次导致了新兴国家的自我实现型发展。这就是第 3 象限的发展模式。BRICs 是这一模式的典型经济，主要的生产和市场在立地倾向上越来越一致，新兴经济得到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其含义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随着市场由发达国家向新兴国家转移，技术和经营的基本概念也将逐渐由适应发达国家市场向适应新兴市场转变，并导致研究开发 (R&D) 也由发达国家向新兴国家转移。

那么，PoBMEs 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关于这个问题，世界银行的研究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论。通过发展劳动集约产业实现了中等收入的国家要进入发达国家行列需要实现产业结构的高度化。1960 年代，世界银行定义的中等收入国家有 101 个，但到 2008 年进入了高收入国家即发达国家的仅 13 个。据 OECD 的一项研究，过去十年里有 28 个国家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但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只有 12 个。由中等收入国家上升到高收入国家存在“陷阱”。包括中国在内，亚洲各国能避免掉入这个陷阱吗？作为主要措施，人们在探讨技术革新、高附加价值化、规模经济、产业链的形成、产业结构的高度化等等。

从地理的角度来看具体的经济，这一发展意味着亚洲经济圈的兴起。据亚洲开发银行的报告书预测，按外汇市场的价格计算，亚洲占世界的 GDP 的比重 2010 年是 27%，到 2050 年将增加到 51%，增加近一倍。“亚洲将再



次获得 250 年前保持的在全球经济中的支配性地位”(ADB 2010:1)。如果成功实现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亚洲将名副其实成为在世界上具有突出地位的富有的经济圈。

实际上,亚洲的发展结构丧失 PoBMEs 型发展的可能性很小。世界经济结构是供给大于需求,生产大于消费,因此,这一问题将持续引人关注。亚洲有中国,还有印度,长期来看俄国也有可能加入到这一成长机制里来。2015 年底,ASEAN 先有 6 个国家结成经济共同体,这种制度性的经济整合今后将得到进一步推进。ASEAN 经济共同体的财富贸易的自由化 2018 年将达到 99%的比率。具有巨大的潜在市场的亚洲地区为新的技术革新提供平台。

就科学技术和 R&D 的世界性动向,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NSB)的 *SCIENCE ENGINEERING INDECATOR*(2014 年版)指出:“在经济停滞中,与 S&E(科学和技术)有关的经济活动在发展中国家得到发展,世界的知识平台型经济活动逐渐的持续向发展中各国转移。其发展在亚洲特别显著,在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很明显。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中国,知识集约型的服务迅速发展。”实际上,世界的 R&D 支出额主要集中在北美、亚洲和欧洲三个地区。2011 年,北美是 4,620 亿美元(占世界总额的 32.2%)、东亚 4,560 亿美元(31.8%)、欧洲 3,450 亿美元(24.0%)。美国是最大的 R&D 国家,占世界总额的 30%。但是,2001 年美国的比率是 37%,减少了 7%。东亚加印度的比率在 2001 年是 25%,到 2011 年增加到 34%,其中中国是 15%,日本占 10%。此间中国 R&D 的实质年平均增加率是 18%。日本企业在亚洲新兴国家的 R&D 活动也急剧增加。据日本经济新闻社对日本主要企业 513 社的 R&D 主管负责人的调查(有效回答 328 社,回答率 63%),回答增加海外产官学提携的企业占 14.6%。建设研究基地的地区美国占 53.0%,ASEAN 地区占 48.5%,中国 40.9%。增加 R&D 的研究员的地区 ASEAN 地区占 47%,接近美国的 48.5%。日本经济新闻解释说,增加亚洲的 R&D“反应了在顾客的附近进行研究开发的姿态”(《日本经济新闻》2015.8.10)。随着作为市场的重要性的增加,亚洲成为了创造竞争力和技术革新的平台。

今后,高龄化和人口减少有可能成为亚洲发展的巨大障碍。但是,所的水平相对较低的新兴经济反过来也预示着发展余地很大。从世界经济的观点来看,在成为发达国家前人口红利就用完了的说明,没有考虑到企业期待绝对人口规模带来的潜在发展的可能性。现在可以说是处于亚洲太平洋经济的时代向亚洲经济的时代转折的局面,而且很可能站在了欧亚经济时代的入口。

### 3. 结构转换与中国

1996 年,中国、俄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五国首脑成立了“上海五国”会晤机制。2001 年加上乌兹别克斯坦,上海合作组织(SCO)正式成立,观察员有蒙古、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2014 年秋,印度、巴基斯坦和伊朗申请正式加盟(「俄罗斯之声」2014.9.10),2015 年夏天召开的首脑会议开始了正式的加盟手续。

刚刚进入本世纪，高盛集团创造的 BRICs 一词很快就被全世界接受，BRICs 进一步增强了自信，2009 年，BRICs 四国开始举行定期首脑会议。2011 年，南非加盟，BRICs 扩大为 BRICS 五国。2013 年 BRICS 首脑会议决定成立 BRICS 银行，2015 年 7 月，新的开发银行开业了。2015 年 6 月，有 50 个国家参加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正式成立。2014 年 8 月，中国和 ASEAN 外相会议同意成立和参加中国主导的 AIIB。第二年 3 月西方七国中有 5 个国家决定加盟 AIIB。发达国家集团中，不参加 AIIB 的只有日本、美国、加拿大 3 国。AIIB 的加盟国增加到 57 个，远远超过当初的预想。这意味着 AIIB 被世界主要国家接受。

当然，这样的动向引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是世界霸权国家美国的防卫性反应。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在参加各国的国内引起了强烈的怀疑，是否生效也不确定，但美国推行 TPP 的背景里有作为霸权国家的危机感。2015 年 10 月 5 日，在美国的亚特兰大召开的 TPP 参加 12 国部长会议达成基本一致，奥巴马总统在发表声明时说：“不能让中国那样的国家制定全球经济的规则，我们应该制定我们想要的规则，应该为美国的产品开拓新的市场，规定保护劳动和环境的高标准。”奥巴马此前也多次表明过同样的主张（Wall Street Journal, 2015.4.28; Walsh 2015）。实际上，小布什政权在 2008 年参加了 TPP 的谈判，但奥巴马新政权担心影响国内的雇佣和经济，退出了 TPP。2009 年底奥巴马出尔反尔重新参加 TPP 谈判，其战略意图是，“归根结底，东亚经济圈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圈，中国是其经济中心，美国要回归这样的东亚经济圈，阻止东亚制定独自的规则”（平川 2014: 51）<sup>2</sup>。

安倍晋三自民党政权上台后，日本在 2013 年 7 月正式参与 TPP 谈判，可以说是把与中国对抗的亚洲政策放在了农业、食品和医疗等国内问题之上。TPP 谈判达成一致当天《日本经济新闻》第一版刊登的日本经济新闻编辑委员太田泰彦的署名文章《环太平洋 决意成长》指出了问题的本质。太田泰彦写道：“谈判的焦点未必只限于其通商协定的本质。TPP 的真正的心脏部分，是制定迄今为止没有过的崭新的国际规则。”“其背景是中国的抬头。……战后经过 70 年，世界现在站在了新的历史交叉点上。TPP12 国在亚特兰大具有共同的危机感和时代认识”（《日本经济新闻》2015.10.6）。日本支持和共同享有美国在亚洲太平洋经济中的霸权，与兴起的中国对抗的构图越来越鲜明。从这个意义上讲，日美两国是试图使“环太平洋”经济圈成为一个成长极，继续掌握其主导权。在结构转换上处于攻守不同方的美日和中国的不和越来越尖锐。

---

<sup>2</sup> 奥巴马总统多次表明了这一想法。2015 年 4 月底，奥巴马在回答华尔街日报的采访时说：“如果我们不制定规则，中国就会制定（亚洲）地区的规则”（WSJ, 2015.4.28）。第二年 5 月，奥巴马在俄勒冈州的耐克工厂演讲时也说：“我们美国必须制定全球经济的规则。我们应该趁现在在经济上还处在全球强国的位置的时候这样做。如果我们不制定世界贸易的规则，中国就会制定。他们就会制定对中国的劳动者和中国企业有利的规则”（Walsh 2015）。

中国主导的新开发银行和 AIIB 的设立是对美国主导的世界金融秩序的挑战。其设立理由是,亚洲开发银行计算 2010~20 年亚洲需要 8 万亿美元的基础建设资金,但既存的国际金融机构满足不了这一资金需要。不过,对 AIIB 的评价是各种各样的。远藤誉一边介绍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2015 年 4 月 14 日报道的《中国金融大动脉》的内容一边写下了批判性的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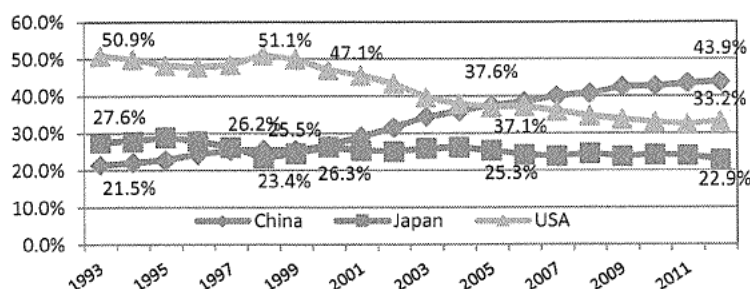
AIIB 是与中国的国家战略“一带一路”密切相连的为中国服务的国际金融机构。“一带一路”是习近平主席 2013 年 9 月在哈萨克斯坦的演讲(《丝绸之路经济带》)和第二年 10 月在印度尼西亚国会的演讲(《海上丝绸之路》)综合起来的构想。这一构想经过同年 11 月的中国共产党第 18 届中央委员会第 3 次全体会议(三中全会),在 2014 年 11 月的 APEC 首脑会议上提出,引起瞩目。关于“一带一路”,也有人认为是向人口稀薄的中亚地区投资,收回成本困难(津上 2015)。但是,如果把欧亚大陆构想与世界经济重心的移动结合起来的话,不应该单纯地把它作为一时性的热潮。从中长期来看,其巨大的可能性不容否定。实际上,这不是个没有实际内容的构想。中国已经开始着手整备铁路等交通设施,亚洲与欧洲之间的物流网的建设也在发展。2008 年 1 月,经由北京→蒙古→俄国→白俄罗斯→波兰的“北京至汉堡特快货车”成功试车,15 天行走 1 万公里。据町田的研究,中国通过铁道的国际陆路运输现在有中国重庆发的 CLB(重庆→西安→兰州→乌鲁木齐→···→白俄罗斯→波兰→德国→比利时·安特卫普,每周两次,到 2013 年 3 月合计运行了 101 次)、成都发的 CLB(成都→哈萨克斯坦→俄国→白俄罗斯→波兰,2013 年 1 月开始运行,每周一次)、郑州发的 CLB(郑州→乌鲁木齐→哈萨克斯坦→俄国→白俄罗斯→德国·汉堡,2013 年 7 月初开始运行,到 2014 年 12 月合计运行了 93 次,从 2014 年 5 月开始每周两次)等在运行之中(町田 2015)。可以预见,今后这样的基础建设将在陆上和海上飞跃性地发展。现在,亚洲和欧洲的联系还很细小,但是,欧亚的联系毫无疑问将通过陆路得到进一步强化。韩国政府也在 2013 年 10 月发表了“欧亚倡议”,提出了与包括朝鲜在内,俄国、中国、中亚各国合作构想。美国的奥巴马总统公开表明要通过缔结 TPP 不使中国制定通商规则,日本的安倍首相强化日美同盟,那么,奥巴马的 TPP 和安倍的日美同盟强化是否能发挥期待的效果,把中国纳入美国制定的规则里?我们需要冷静研究 TPP 生效对中国的影响及中国可能的应对。

#### 4. 结构转换带来的贸易结构与中国及其周边各国

2010 年前后,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位的 GDP 大国。1990 年代以来,高速成长的中国的贸易使东亚各国产生了很大的结构变化。进入本世纪后,几乎所有东亚国家最大的对外贸易国都变成了中国。图 4 显示的是东亚的对外贸易国结构的变化。到 1990 年代前半期,东亚的主要对外贸易国是美国和日本。1990 年代后半期开始,中国首先超过日本,接着在 2005 年超过美国成为最大的对外贸易国。就是说,亚洲对中国的依存程度急剧加深。

从表 2 可以看出东亚各国的对华出口额超过对日出口额和对美出口额的年份。从中可以看出,除个别国家例外外,进入本世纪后,东亚各国的对华出口先是超过日本,接着超过美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也是同一路径。中国本身对美出口在 20 世纪末超过对日出口,进入本世纪后对美进出口贸易总额超过对日进出口贸易总额。东亚各国在进入本世纪后中国的分量超过美日,不过中国在进入本世纪后不久对美贸易就超过了对日贸易。从贸易的观点来看,日本在东亚的存在感大幅后退,东亚各国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越来越高。就是说,出现了以中国为基轴的东亚发展结构。

図4 東アジア主要国の対米中日貿易の変化 1993-2012



Note: 対象は、韓国、台湾、シンガポール、タイ、インドネシア、ベトナム、日本、中国、香港の9カ国・地域。台湾以外のデータはUN Comtrade による。台湾のデータは2013年のみ Custom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Finance のデータ。それ以外は Taiwan Statistical Data Book 2012 による。なお、ベトナムのデータは2000年以降のみのデータである。

Source: created from UN Comtrade; Taiwan Statistical Data Book 2012; Custom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Finance, Taiwan.

ASEAN 成立于 1967 年,但实质性地经济整合是在进入 1990 年代以后。受 1980 年代后半期开始的欧洲经济整合和中国兴起的影响,ASEAN 开始尝试创建一个经济圈。1993 年,ASEAN 自由贸易区(AFTA)成立,亚洲货币危机致使 ASEAN 经济共同体(AEC)创建,目的是通过形成大规模的经济圈创造出潜在的大市场,从地区外的发达国家引进资本,实现自身的发展。

换个角度,从地理来看这个结构转换的话,如上所述,现代是从亚洲太平洋经济的时代转向亚洲经济的时代的转折期。亚洲是中国、印度、ASEAN 等拥有巨大人口规模的潜在大市场经济的新兴国家聚集的地区,并于欧洲有着多种联系。TPP 就如奥巴马公开表明的那样,是为了不让中国制定规则的,为了美国的,亚洲太平洋经济的通商规则。然而,经济在由亚洲太平洋向亚洲急剧转移,在这种背景下,缔结 TPP 对中国的影响可能比预想的要小。对此需要详细研究,但期待过大可能会导致失望。不是说亚洲太平洋将衰退,而是说亚洲将持续成长,重要的是如何创建两个经济圈共同发展的关系和秩序。这种关系和秩序需要的是,新兴国家能够接受的新兴经济能实现均衡发展的规则。

表 2. 主要东亚国家对日本、美国、中国的出口发生逆转的年份  
(2013 年现在)

		対日<対中	対米<対中
韓国	輸出	2001	2003
	総計(輸出入)	2003	2004
台湾	輸出	2003	2004
	総計	2005	2004
シンガポール	輸出	2003	2007
	総計	2004	2007
タイ	輸出	2009	2010
	総計	2007	2013
マレーシア	輸出	2009	2010
	総計	2009	2009
インドネシア	輸出	未	2009
	総計	2013	2006
フィリピン	輸出	未	未
	総計	未	2013
ベトナム	輸出	未	2002
	総計	2004	2000年以前
モンゴル	輸出	1996年以前	1996年以前
	総計	1996年以前	1996年以前
日本	輸出	-	2009-2012
	総計	-	2007
(参考)中国	輸出	対日<対米	1997
	総計		2004

注：表 2 左列由上至下依次是：韩国、台湾、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蒙古、日本、（参考）中国。“対日<対中”即对中国出口额超过对日本出口额的年份。“対美<対中”即对中国出口额超过对美国出口额的年份。中国的“対日<対美”即中国的对美出口额超过对日出口额的年份

## 5. 东亚的新课题和中日的历史责任

世界经济在进行着戏剧性的结构转换。这一结构转换是通过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结构性的支撑新兴经济的发展而得到实现的。PoBMEs 作为扩大的市场实现发展，要求既存的国际秩序重构。亚洲的新兴经济由于其参加市场的人数急剧增加，其地位越来越得到强化。今后，新兴经济受景气动向的影响在短期内出现曲折是不可避免的，但从总体上将维持超过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结构转换肯定将导致从亚洲太平洋经济的时代转向亚洲经济的时代，尽管其步伐将可能有快有慢。从长期来看，欧亚大陆的时代到来的可能性也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就下结论说 AIIB 和中国的“一路一带”构想是痴人说梦还为时尚早。如果闭目不看这种现实，会犯时代性的错误。

另一方面，在世界层面发生的结构转换的课题同时也出现在地区层面。PoBMEs 阶段出现的地区内构成的变更带来了各种各样的调整问题。特别是，地位发生了更替的中日两国之间，这方面的课题非常深刻。以中国的 GDP 超过日本的 2010 年前后为界，两国的外交姿态明显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

一年，在尖角诸岛（中国名：钓鱼岛）近海发生了中国渔船冲撞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巡视船的事件。2012年中日围绕尖角诸岛（中国名：钓鱼岛）的领有权之争，两国政府都采取了缺乏灵活性的外交姿态。在日本，安倍晋三自民党政权不顾日本国民的大多数的反对和严重违反宪法的批判，于2015年9月在参议院本会议强行通过了安全保障关联法案。日本的专家学者里强烈主张中国威胁论的人越来越多。曾经是日本代表性的研究亚洲经济的专家渡边利夫断言中国是“迟来的帝国主义国家”，攻击习近平总书记提倡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复兴大清帝国，主张必须强化日本的民族主义，通过与美国结盟来对抗中国的野心（渡边2016）。安全保障关联法案获得国会承认后，日美军事同盟越来越得到加强。

中国的姿态似乎也确实在变化。2001年，当时的小泉纯一郎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时，中国采取了“政冷经热”的政策，只是停止了两国间的首脑会谈。但是，2010年就不只是这样了。中国采取了停止稀有金属的对日出口、拘捕日本人的强硬措施。2013年底，中国在东中国海设定了战斗机可以紧急起飞的防空识别区。

这种姿态在南中国海也是一样。菲律宾、越南等与中国之间在南海存在领有权问题，2015年，中国在其实际控制的岛礁人口造岛，并建立军事设施，有报道说还在尝试设立防空识别区。在南海问题上，2002年ASEAN和中国缔结了《相关国家南海行动宣言》，但中国与菲律宾、越南之间领有权问题恶化，2012年的ASEAN外长会议及相关的会议没能就南海问题发表ASEAN共同声明，因为柬埔寨照顾中国的立场，没有接受菲律宾和越南的主张。2014年以来，中国与越南、菲律宾在南海的领有权问题上对立更加深刻化。中国在岩礁上造岛和修建军事基地，美军对此进行警戒和监视活动，这些超越地区给人们带来各种冲击，成为国际社会的重大议题。

中国和日本、中国和ASEAN各国的对立的尖锐化，日本无疑在其中起了作用。但是，东亚地区越来越多的人感到中国的姿态是强硬的或傲慢的，这也是事实。这可以认为，中国的外交姿态已经由1990年代邓小平的“韬光养晦”转变为习近平总书记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背景是中国的地位的变化。英国的国家战略研究所（IISS）2016年的《军事平衡》报告书指出，亚洲各国处于应对中国朝向海洋的膨胀，“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海军力量在增强”。可以说，在东亚地区，经济方面与中国的关系在加强，但在外交、国际安全保障方面，对立在激化，两者同时进行。

但是，从亚洲的将来来考虑问题的话，中国和日本无论是在亚洲地区内还是在地区外都负有特别的责任。时代在从亚洲太平洋经济的时代向亚洲经济的时代转换，这意味着中国在世界上的存在感和影响力不断提高。正因为如此，特别是中国，作为站到地区社会的领导地位的构成员，要求必须采取更加负责任的行动。中国应有的姿态是对等地对待地区的构成员，率先为实现非暴力的国际社会而努力。不是成为新的霸权国家，而是成为受亚洲和世界尊敬的国家和人民。日本的作用也极为重大。作为地区的主要国家，必须正视自己的历史和未来，不是努力煽起对立，而是努力加深相互理解。

以 ASEAN 为首，其他亚洲成员国谋求地区安定的努力也是把亚洲建立成为公正、富裕的地区社会的重要因素。要克服地区内的对立，努力实现地区协力。在这一点上，1997 年货币危机后 ASEAN 创建的 ASEAN 加 3 首脑会议、东亚首脑会议等制度是维护地区和平与繁荣的公共财产。对国家间的对立，不使用武力，重视通过相互尊重、对话形成合意，这些 ASEAN 的经验是东亚地区积累的宝贵的建设性财产。

在东亚各国内部，东亚正在成为高龄化社会，国内的所得格差在扩大，环境问题严重，存在一系列重大课题。中国及其他成长中的亚洲各国都面临着这些课题。但是，如本文所分析的，从世界经济的观点来看，世界经济也是处在重大的结构转换之中，由此带来了许多新的课题。相互合作来解决这些课题是最行之有效的途径。东亚在重新回到历史上富裕的地区社会，不可放弃这一机会。中国和日本对此负有极其重大的责任。